

导论：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

——兼谈建立中国大众传播学的一点思考

常昌富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影响研究”这一术语有着独特的含义。它是指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媒体对观众的影响。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特点：影响研究不是研究媒体对社会的政治、结构、组织、制度等等的影响；影响研究不是运用人文的或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的。^①在美国，自20年代电影作为新的媒体出现，社会学者想知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如何，到今天信息时代人们想知道“因特网”对我们的影响如何，影响研究一直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主流。它体现了美国学术的特点，也体现了美国文化的特点。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社会科学的特点、影响研究的理论和范式演变、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些问题和建立中国的影响研究的一点思考。^②

① 研究媒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往往被称为媒体的“批评和文化研究”（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或“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

②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阅了 S. Lowery & M. De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5);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Perspectives on Media Effect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6); R. Liebert & J. Sprafkin, *The Early Window: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Children and Youth*, 3rd e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8).

一、以现实为基础的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界限

“社会科学”顾名思义是指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在西方的传统学术中，存在着两分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人文科学的这一栏目下，有文学、哲学、历史以及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等。在自然科学这一栏目下，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这两分法，自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以来，渐渐被三分法所取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领域。自然科学也称为硬科学，社会科学称为软科学，而人文领域就无所谓科学不科学了。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领域是两极：前者以研究物质，探讨物质运动的规律，运用严格的科学的方法；后者表达人生，揭示生命的意义，它充满想象和自由。在这两极中间是社会科学，它是研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背景下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社会群体等等社会现象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群体或由社会群体构成的社会现象，它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对研究对象得到绝对的控制和绝对的了解，它永远是严格意义上的准科学；因为社会科学是与社会的政治和政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其研究的结果是行政部门制定政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它更不可能像人文学科那样根据个人的好恶，随心所欲，充满想象。一项政策的制定固然与党派利益有关，但它必须依据专家、学者的数据——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来进行。社会科学方法也就是量化的方法，也称为“经验的”（empirical）方法。Empirical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感官可以感知或觉察的。

社会科学何以走上量化的道路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科学的发展、民主意识的增强），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也许我们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者和人文学者是用不同的方法来看世界的。让我们先随便举几个例子：媒体中充塞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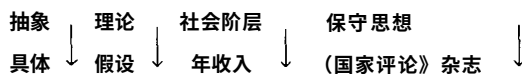
和色情对观众特别是对青少年有没有坏的影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凭直观不约而同地作肯定的回答，并将美国社会的各种暴力与色情与媒体的宣传挂上勾。然而，也有人会否定的回答。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和弗洛伊德的“升华说”，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媒体中的暴力和色情会净化掉人们的恶的冲动。当每一种新的媒体出现时，理论家们就会对媒体将产生的影响作完全相反的预测：以因特网为例，有人说它将给全世界带来民主的福音，因为人民将最大限度的拥有各种信息、各种观点；有人却说它将给人类的民主事业带来威胁，因为正是这些良莠不齐的观点，使人们变得软弱，失去是非判断，更有可能被邪恶的东西引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谁的呢？是凭直观还是社会调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出了东西文化的一些差别。东方文化重直观，多采用定性的方法；西方文化重分析，多采用定量的方法。这在生活的一些细枝末节上也看得出来。在美国家庭的厨房中，你会看到装水的杯子上大都有刻度，做菜总是按照菜谱来，放多少盐、多少油、多少水，都是准确地量好了的。要是美国人问你怎么做米饭，你的回答要说“一磅米配多少磅的水。”显然，在美国人的思维里，数据往往比直观来得更可靠。将大众传播影响研究定位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也体现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 1996 年颁布的新电讯法。该法规定，在因特网上给未成年人传送黄色的东西是违法的行为。美国以“民权协会”为代表的几十家组织上诉高等法院，指责新电讯法违背宪法，与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相抵牾。高院裁定，新电讯法违宪。在给出的众多理由中，其中一条便是：目前没有具体的研究数据表明电脑黄毒对青少年有害！

社会学的方法

社会学家大多从某种理论出发，到现实生活中寻求经验的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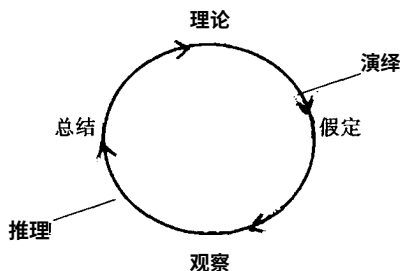
明，来确认理论的有效性。理论是关于现实的抽象的概括。它往往表现一组或几组抽象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抽象性，理论本身是无法证明的。但是，我们可以将理论中的概念具体化，将它们转换为可以观察的、实证的东西，也就是“指标”（indicators）。这样，根据理论，便可提出具体的表示指标之间的关系的假设。例如，理论预测，社会阶层与保守思想有关。社会阶层与保守思想都是抽象名词。我们必须界定什么是社会阶层，什么是保守思想，将它们具体化，在生活中寻找它们的对应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如职业、教育、家庭。在美国，年收入是社会阶层的一个比较忠实的指数。一个人保守与否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如举止、言谈、所属的党派等等。同样，《国家评论》杂志长期一直是保守思想的阵地，它可以作为一个指数。从抽象的概念下降到具体的指数是很重要的步骤，某一个指数能不能准确衡量概念牵涉到“有效性”（validity）的问题。而且，社会学的研究是以一般人为前提的。比如说，也有个别人社会阶层低下，却年收入颇丰；同样有一些人社会地位高，但思想并不保守。从理论到假设、从抽象到具体，我们可以看下图：



研究人员通过社会调查，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处理，可以看出在年收入与订阅《国家评论》杂志之间存在不存在某种关系。关系是指“协同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上面假定中所预测的关系是正面的，即年收入越高，就越有可能订《国家评论》。如果调查的结果正相反，年收入越高，订《国家评论》的越少，那么这种关系就是负面

的。这种关系的程度如何，社会学领域有一系列的计算方法来判断。

许多教科书将社会研究的步骤比喻成“科学之轮”。下图说明了理论与研究的关系。理论提供假定，后者为具体的观察所证明。这些观察的结果产生经验性的总结。如果经验性的总结支持假定，我们对理论的信心会更足。如果经验性的总结否定假定，我们就对理论质疑。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研究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方法获得假设，从假设获得观察或数据，通过科学地处理数据得出结论，支持或质疑理论。在某种现象没有预先的知识时，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理论，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观察，那么，我们则主要运用推理方法。演绎是指从普遍到具体——从已知的原理到未知的、可观察的结论。推理是从具体到普遍——从一系列观察到概括。



以《多数无知与沉默螺旋：大众传媒在沉默螺旋的假设中作用的一个测试》一文为例，概括西方通常看法，公众舆论是指个人观点的总合。然而在研究德国竞选活动时，欧洲学者内尔-纽曼提出，公众舆论是指个人认为在公共场合可以安全地发表的观点的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新的理论。围绕这一理论，研究人员提出许多假设。在所选的文章中，作者提出 3 个与大众传播有关的假设：1. 那些运用媒体多的人比运用媒体少的

人更有可能准确地判断某个具体问题的公众观点；2 那些运用媒体多的人比运用媒体少的人更有可能准确地察觉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是与大多数人还是与少数人一致；3 问题的特显性比大众媒体的运用更有力的预测表达。从这些假设出发，作者设计研究方案，收集数据（观察），科学分析（结果），最后讨论这一具体研究与理论的关系。

社会科学报告的写作方法

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主的一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大众传播学、政治学的文章中大多包含类似的部分：摘要、介绍、文献评论、方法、结果、讨论、参考文献。摘要部分一般 100—200 个字，说明作者研究的问题；介绍部分提出问题、背景和重要性；文献部分总结就这一课题已有的研究；方法部分包括如何设计研究（社会调查、实验等等）、如何选择对象（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等等）、如何操作和收集数据（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具体的指数、将收集的材料进行数字代码即量化等等）、统计方法；结果部分阐述研究的发现；讨论部分指出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以及将来这一课题的方向。^①

二、影响研究的理论与范式的演变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代，为弄清媒体的影响，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理论和方法。这些研究涉及了许多领域，如电影对儿童的影响、政治竞选中媒体的角色、听众从收音机中的节目中得到的满足、以及电视内容诸如色情和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等等；在理论和范式上带来了一系列的演变，如运用和满足、日程

^① 参见 R. Stark, & L. Roberts, *Contemporary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Bellevue, WA: MicroCase Corporation, 1996).

设定、技术的传播与吸收、二级传播、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等等；在具体的课题上不断有所开拓，如暴力和色情、广告和程式化等等；在方法上创造性地采用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内容分析、社会调查、试验等等，有些研究设计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经典之作，为许多不同学科介绍。

尽管上述研究的结果各不相同，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史的角度看出三个明显的演变过程。总的说来，影响研究从最初的神奇的子弹理论发展到后来的有限的和有选择的理论再发展到当代的社会化和潜移默化的理论。

魔弹理论

传播学的研究者在描述范式的演变时都不约而同地追溯到“魔弹理论”(Magic Bullet Theory)，有时也形象地称之为“皮下注射理论”。这两个比喻说明，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立竿见影的。然而，在考察传播学研究时，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一理论的证据。也许我们对新事物了解之前总是有某种或是预先的、或是直觉的、或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观点。魔弹理论大概就是如此。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它们象一种潜意识为人们所保存，这是一种直觉式的恐惧，这种恐惧每当一种新的媒体出现的时候，它们就不知不觉地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恐惧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

根据德弗勒的看法，魔弹理论也有其一定的科学基础，即达尔文进化论关于人性的观念。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为人们所接受的宗教的人性观认为，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而创造出的“理性的”动物。从达尔文开始，科学的人性观占了上风，强调遗传与生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受这种遗传观的影响，社会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放弃了关于“理性的”人性的阐释，注重人性的动物性的一面。他们认为，高级动物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没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由于共同的遗传的本能，某一种类的动

物的行为大体上是一致的。以此类推，人也是由于生理的遗传的本能而对某种刺激产生相同的反应。在这种人性观的指导下，人对刺激的反应被认为是由本能或潜意识主宰的，而不是由人的理智或智力所操纵的。将这样的认识与现代大众传媒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某一群受众来说，他（她）们对精心制作出来的大众传播作品（刺激物）的反应是一致的，因而在早期观点看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公众。^①

这种魔弹论部分地得到支持是 20 年代末第一次大规模的电影研究。这次研究是第一次全面而系统的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于大众传播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奠定了美国影响研究的基础和性质。电影自本世纪初出现，到 20 年代成为美国家庭主要的娱乐形式。电影中的凶杀和恐怖的场面、低级趣味的东西令社会批评家关注：它们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由“裴恩基金会”赞助的、持续三年（1929—1932）的电影研究是第一次运用当时争议还很大的社会学的方法于媒体研究，可以说是现代影响研究的源头。这次研究包括 13 项具体的研究，可以笼统的分成两大方面：一是对电影的纳入和观众的成分进行分析；二是试图了解各种电影内容对观众的影响。关于第一方面，埃迪加·戴尔的研究最有说服力。戴尔观摩、分析了 1,500 部影片（1920 年 500 部，1925 年 500 部，1930 年 500 部），将内容分成凶杀、色情、爱情、神秘、战争等 10 类，发现其中四分之三的内容是凶杀、色情和爱情。这是最早期的“内容分析”。^② 戴尔除了采用已有的统计数据获得观看电影的人数外，还从俄亥俄州的 50 个居

① 参见 M. DeFleur & E. Dennis, *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 A Liberal Arts Perspective*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4), P540-41; S. Lowery & M. De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USA, 1995), p. 12-14.

② 有关传播学主要运用的“内容分析”“社会调查”“试验”等方法，请参阅本书最后部分。

民区实际的电影观众来断定观众的年龄结构，以此来推出全国的情况。戴尔分析表明，5岁至8岁的小孩以开始到电影院，最频繁的是小学和中学的学生。男生超过女生。

关于第二方面，可以分如下几组重要的研究。1. 豪勒戴和斯塔达德花了三年时间对3,000名儿童做试验，以17部完整的电影做刺激材料。他们在对象观看影片后的6个星期和3个月测试了影片中的主要情节和次要细节，发现就是8岁的小孩也能记住电影中的细节，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在3个月时比6个星期记得更多。2. 皮特森和射厄斯顿研究电影对观众的态度影响。他们让儿童看不同有关少数民族和种族问题的影片，在观看前后进行测试。总的说来，电影对儿童态度的影响是明显的。3. 代欣格和茹斯尼克运用试验方法和自传体方法来测试电影对观众的情感刺激。他们在7组年龄不同的儿童皮肤上装有电子感应器观察和记录他们在看色情、凶杀等内容的电影时的反应。他们对成年人也作观察以进行比较。试验发现，影片对儿童的情绪影响极大。4. 心理学家若恩肖和米勒等人研究电影对儿童的身心的影响。他们测试了170名少教所的儿童，观察他们正常的睡眠状态，和他们看完电影之后的睡眠状态作比较，发现电影对睡眠产生影响，对身心健康有负作用。5. 皮特斯的研究是看电影会不会使道德更为沦丧。他们先后找了17类不同层次的人就电影中所反映的道德倾向是否与现实生活的道德规范有出入，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6. 最重要的、最支持魔弹论的是几项对行为影响的研究。夏多华斯和麦义将经常看电影的儿童与很少看电影的儿童作比较，比较他们的总体行为、在学校的表现、和同伴的评价三项，结果是电影迷在这三项中都远远不如非电影迷。布鲁姆尔研究电影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行为的影响。他让几百名大、中学生用自传的形式介绍电影对他们的影响。学生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坏习惯都是从电影中学来的。布鲁姆尔和豪斯尔还研究少年犯罪与电影的关系。同通过对具体犯罪少年的案例分析、问卷调查等

等手段收集数据，得出结论，电影是导致少年犯罪的根源。

尽管布鲁姆尔等人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受到一些质疑，媒体会强有力地直接影响观众的观点却为不少人接受。特别是在 1938 年底“星球大战”广播剧引起的成千上万的观众大恐慌的事件更让一些人深信不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万圣节”到来之际，在晚间的“空中剧场”中用现场直播的形式将威尔士描写外星人进攻地球的科幻小说《星球大战》播出来。由于在播放中采用了大量的拟真音响和维妙维肖的采访，无数听众以为人类劫难真的来临，恐惧万分，纷纷弃家而逃。这一事件引起普林斯顿大学“无线电研究办公室”的重视，对观众进行跟踪调查。）

有限的和有选择性的影响的理论

虽然 20 年代大规模的电影研究和 1939 年的“星球大战”的广播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魔弹论，并且两次研究的部分结果能支持这种理论的假设，然而，它们却也是动摇这种理论的主要事件，特别是 1939 年的研究。为什么有些听众惊恐万分，而为什么有些听众并不是这样？这就让人怀疑魔弹论的可靠性。这样，研究者就把注意力投到不同的个人构成上。研究者开始将更多的因素——变量考虑进去。

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影响论（Selective and Limited Influences Theories）也是和其他学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 20 年代末起，对传播学具有重大的影响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对人的本质和社会秩序有了全新的看法。个性差异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点，认为人们的需求、态度、价值观、智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在人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结构，即将社会划分成各个组成部分（经济等级、种族类型、社会组织如家庭、宗教、政府等等）来研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相类似的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的特征。他们发现，人的社会的文化参数（家庭的经济状况、社会阶层、年

龄等等)有力地影响人的行为。这种对于个性差异和社会差异的关注影响了传播学者的视角。人们开始质疑魔弹论。40年代对参加二战的士兵和总统竞选的两个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彻底动摇了魔弹论,人们对于媒体如何影响观念、举止有了新的认识。

二战时,美国要征召无数对战争的性质、规模、结果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国防部请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制作一系列题为“我们为何作战”的宣传片,旨在让士兵了解盟军参加战争的正义性,增强盟军必胜的信心。由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抽样对数批士兵进行实验,调查的结果是,“我们为何作战”系列片对介绍战争的起源有一些成效;对改变人们对这些事实的总体而不是具体的看法也有一些作用。然而,这些片子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激起观众的战斗热情、增强对盟军的信心、灌输对敌人的持久的憎恨。而且,对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效果不一样,总的来说,教育程度越高,从电影中得到的东西越多。

1940年对媒体与人们的竞选行为的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也是动摇魔弹论的主要研究之一。拉札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高德特从俄亥俄的一个县抽样出3000名对象,将他们分成相同的4个小组,其中的一个组为主要调查组,从竞选前5月份到竞选后11月份每月进行跟踪调查。其他为3个控制组,研究人员则分别在7月份、8月份、10月份对其中一个组进行调查,与主要调查组作对比。^①

研究发现,人们的竞选行为相当复杂,受多种因素或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宗教倾向、居住地(县城或农村)、职业和年龄的制约。比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比地位低的更倾向于选共和党,蓝领工人比白领工人更倾向于选民主党。信仰天主教的

^① Paul Lazarsfield, Bernard Berelson, &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人更倾向于选民主党，信仰清教的人则倾向于共和党。如果将年龄考虑进去，则发现，年轻人倾向于选民主党，年长者倾向于选共和党等等。对于传播理论来说，研究者发现，研究对象在对大众传播的媒介上和接受别人的影响上是有选择性的。

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作选择时还有其他因素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人们不断地从亲朋好友那儿获得信息，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人际之间的交流或传播比起大众传播来更具影响。研究人员称这意外的发现为“传播中的二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现象。当以新的眼光审视获得的原始数据时，他们发现，有一部分人总是比别人消息更为灵通，充当他人的“观点领袖”（opinion leaders），影响他人。所以，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作者首次提出这样的假设：“观点常常是从收音机和刊物流向观点领袖，再从这些人流向芸芸众生。”^①

这一假设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魔弹论，也促成了 1945 年在美国依利诺斯州的迪凯特（Decatur）县进行的旨在验证这一假设、了解观点领袖这一角色的研究。迪凯特研究想弄清观点领袖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四个方面——购物、选择时尚、判断公众事务和看电影——的影响。在 1955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人的影响）一书中，作者凯兹和拉扎斯菲尔德支持了传播“二级传播”的假设。^②从大众传播研究史上讲，这次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大众传播学首次从对信息资源和受众的心理的研究转向对在传播过程中人们相互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导致的影响的研究。

无独有偶，早先在 1941 年的一个研究中，莱恩（Ryan）和格罗斯（Gross）研究依阿华农民如何接受新技术、媒体在这一

^① Ibid., 151.

^② E. Katz & P.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55).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也注意到农民间的人际交往对其作出决策的影响。^① 这一发现也否定了大众传播的魔弹论，以后出现的“创新的推广”（Diffusion of Innovation）这一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在寻找人们对新事物的采用时也充分将对象的社会网络考虑进去。如罗杰斯（Rogers）所说，创新的推广就是指技术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一定的渠道在一定的社会系统内的成员之间的传播^②

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利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它从受众的角度来研究人们是怎样来选择媒体的内容，怎样将从媒体中获得的信息运用到生活之中，又怎样从中获得满足。根据魔弹论，受众应该是被动的、相同的，某一种信息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式的、一致的。赫特·赫兹奥格（Herzog）在40年代初对广播连续剧听众的研究显示，听众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获得什么样的满足是因人而异的^③

到此为止，传播界基本上清算了魔弹论。这种有限和有选择的观点在克莱勃尔（Joseph Klapper）1958年的《大众媒体的影响》一书中得到明确的表达：1. 媒体看起来并不像一般人过去和现在所想象的那么有力。一个人对媒体所传递的某种信息的注意与其观念、态度、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2. 许多研究发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确在观众身上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而言是轻微的；3. 这些信息在观众身上产生的影响的条

① 参见 B. Ryan & N. Gross, "The Diffusion of Hybrid Seed Corn in Two Iowa Communities," *Rural Sociology* 8 (March 1943): 5.

② E.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 5.

③ H. Herzog,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Daytime Serial Listeners?" in P. Lazarsfeld & F. Stanton, *Radio Research 1942—1943*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4), P. 3—33.

件比起原先研究的要复杂的多。^①

议程设置、社会化和教化的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

魔弹理论中，因果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媒体的消极内容必然导致受众的消极行为。在有效的和有选择的理论中，那种将受众看成千篇一律的观点得到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因人而异的观点。然而，说媒体影响甚微又多少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媒体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可以说是由无数我们永运不能穷尽的方方面面组成的。然而，就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来说，我们生活的内容却因着媒体的存在而变得十分相似。从 60 年代过来的美国人，在其生活的阅历中，都离不开越战、总统遇刺、民权运动等等。就新闻媒体来说，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但总是只能选择少数几件。早在 1922 年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李普曼在他的《公众舆论学》一书中就说，新闻媒体起着为我们界定现实的作用，不光是在总统竞选时，而且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② 新闻媒体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为我们建构现实，而且通过对现实事件的筛选将我们的共同注意力集中到某几件事上，在这些事件上贴上重要性的标签。魔弹论和有效的影响论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看来，必须有某种新的理论或假设来指导大众传播的影响研究。这种理论之一就是传播学者提出媒体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功能。

1963 年柯恩在对美国报业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的研究中，十

^① Joseph T. Klapper, *The Effects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0).

^② W. Lippma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分简洁地阐述了媒体的这种功能。他说，媒体也许不能成功地让我们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会极其成功地让我们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①顺着这条思路，研究者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媒体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选择性报道也许不能一下子改变人们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存在的是非观点，但会让人们觉得它们的分量，也就是说，媒体对某个方面越是报道，人们也就越觉得这个方面重要。^②1972年麦克姆（McComb）和肖（Shaw）两位学者以1968年总统竞选为例，验证上述假设。他们在北卡罗莱纳州对100个选民进行调查，让被调查者说出在他们自己看来哪些是那次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研究者将被列出的重要议题与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报道作比较，发现这两者之间有惊人的对应关系：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也是媒体报道最强调的，不论竞选人有没有强调。这之后，许多研究者又做了许多类似的但规模更大、更科学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议程设置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范式。它的出现从大众传播影响研究史来说具有双重的分水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第一个由传播学者根据新闻理论而不是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提出来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它基本上背离了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目光投向媒体对受众的长期影响上。^③

当然，这里要指出议程设置模式在解释上的弹性。当人们考

① B. Cohen,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3.

② M. McComb & D.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 176-187

③与议程设置相类似的一个理论模式是“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它最初由欧洲学者诺洛-纽曼提出。纽曼认为，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观点与大多数人一致时，他更倾向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反之，当一个人觉得其观点与大多数人相左时，他更倾向于沉默。美国传播学者将人对公众舆论的察觉与对媒体的影响联系起来。参见 E.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1974): 43-51.

察在竞选活动中的媒体对受众的日程设定的功能时，其影响可能是短暂的；当人们考察在文化和现实的建构上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功能是，其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影响研究才有了大的范式上的转向——研究媒体的长时间的社会、文化功能。

社会化理论和教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是由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本多拉（Bandura）提出来的。传统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人的行为是外部条件引起的；另一种认为人的行为的动因是冲动。本多拉综合这两种说法，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外因和内因的交互作用而引起的。他指出，一种行为的产生大体上要经过三个过程：首先是注意，对外界的某种行为的注意和观察；其次是保留，对所注意的行为进行内消化，在象征、认知等层次上理解，在象征、实际中重演；最后，在时机到来时便实施这一行为。^①

在整个过程中，行为的展示或示范对儿童来说是最关键的。要让儿童学某种新的行为，最好的和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这行为示范出来。本多拉作了一系列的令人信服的试验，其中最有名的是“波波玩具娃娃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本多拉以幼儿园的孩子为对象，把他们分成几组，让他们观看一个“示范员”粗暴地对待一个“芭比玩具娃娃”的影片，不同的小组看到不同的版本：一组看到示范员粗暴地对待玩具娃娃就结束；一组看到示范员因粗暴行为受到惩处；一组看到示范员因粗暴行为受到奖赏。看完影片，研究人员将三组儿童放在三间有同样的玩具娃娃的房间，观察他们的行为。除了“惩处”组没有对玩具娃娃殴打，其他两组都模仿了电影中的示范员，立即对玩具娃娃粗暴对

^① A. Bandur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待。虽然“惩处”组的儿童没有对玩具娃娃表现出暴力行为，但根据社会化的理论，他们已学会了暴力行为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实施出来。为了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走进三个房间，告诉他们，如果谁能模仿出电影中的那些行为，谁就可以得到一瓶果汁。每模仿出一个，就多一瓶果汁。结果所有组都比例很高地模仿了暴力行为。本多拉运用社会化的理论来解释电视暴力与青少年行为之间的关系。从 50 年代起，电视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1954 年和 1961 年参议院专门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听证会，1964 年参议院的一份报告和 1968 年“美国阻止暴力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都认为，电视上充塞着暴力，这些内容可能对青少年有害。1969—1970 年在美国卫生部长的干预下，花一百万进行一次巨大规模的调查，想弄清电视暴力与儿童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本多拉是调查组成员之一。虽然这项研究的成员选择和最后的报告的写作得到很多非议，许多研究表明：观看电视暴力增大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概率；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更有可能看暴力节目。^①

社会化理论成为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研究儿童暴力行为的重要理论依据，它较有说服力地揭示了暴力行为产生的复杂过程。这一理论不光是针对媒体的，而是阐释一般的暴力行为。

教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与社会化的理论类似，它最初由格博纳（Gerbner）于 1969 年的《走向文化“指数”：大众传播化的公众信息系统的分析》一文中提出来。在这篇文章中，格博纳旨在开创一种新的范式，既不研究信息，也不研究直接影响。而是研究“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集体的语境中如何选择和解

^① 这次以电视与儿童的社会行为为主题的研究报告有 7 卷本之多，常称之为（卫生部的报告）（Surgeon General's Report）。其中包括：*Television and Social Behavior*；*Media Content and Control*；*Television and Social Behavior*；*Television and Social Learning*；*Television and Social Behavior*；*Television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ness* 等等。